



苏商精神及其社会价值

○ 卢雄勇 著

文化蘇商、誠信
蘇商四大品牌。重新建構蘇商
蘇商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現代蘇
系。不僅是現代蘇商們自身發展所需
也是全社會和地區發展所要。是融合
使命與社會責任

蘇商精神

言夢



江蘇教育出版社
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苏商精神及其社会价值

卢雄勇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书 名 苏商精神及其社会价值

主 编 卢雄勇

责任编辑 赵 明

装帧设计 王 怡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前锦排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核工业南京华宁彩色印刷厂 (电话:025-83347217)

厂 址 南京市察哈尔路16号(邮编 210003)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5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1341-1

定 价 30.00 元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854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E -mail jsep@vip.163.com

盗版举报 025-83658837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序

郭广银

苏商是一个具有独特人文特质的商人群体。苏商群体的特征在于 5 000 年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精神的融合,并在这种融合中不断实现创新和自我提升。苏商精神底蕴深厚,由来已久。传统苏商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在行为上受到儒家传统伦理的影响较深。因此,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把苏商群体的精神特征看作是成功企业家内在的意识、理念、胆魄和魅力,并以此为标尺之一识别、挑选和评价苏商。苏商精神的研究,既反映了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要求,又展现了历代江苏人民的精神面貌,具有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推动力,是现阶段江苏推进“两个率先”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不竭力量源泉。目前,苏商精神研究在国内学术界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有很多领域、许多方面需要伦理学界下功夫去研究和进行系统的梳理,探求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轨迹,揭示其自身所固有的规律,从而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上,对苏商精神的精华和糟粕作出自觉的抉择。可喜的是,现在已经有许多有识之士抱着时代责任感,积极从事苏商精神的研究和建设。卢雄勇同志就是其中出色的一个。作为一名任职于党委组织部门的同志,他克服工学矛盾,自 2007 年起在南京大学哲学系伦理学专业攻读博士研究生,并配合导师先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研究》、江苏省哲学社科联基金项目《后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苏商伦理建设研究》等研究课题,撰写的多篇关于苏商精神研究的学术论文先后发表于国内学术期刊。这本书就是卢雄勇同志在杨明教授指导下,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研究论著。

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强调道德对于经济的积极作用。孔子从仁学出发,高举“义利之辩”的大旗,明确提出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命题,确立了“见利思义”的德性主义价值取向。同时,孔子对于“民之利”,对于满足人类基本生存需要的“饮食之利”,以及通过正当方式取得的“利”等的伦理正当性是持肯定态度的。孟子把不义而取利与亡国相提并论,认为“天子不仁,

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荀子更是强调“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可见儒家先贤对以义取利的重视。崇文而不尚空谈、包容而不惧竞争、内敛而不失大气，是历代江苏人的典型风格。从明末清初到近代几百年间，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急剧变动、苏商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儒家传统伦理观念的差序梯级形态，推动苏商逐渐形成以儒家经济伦理为核心，具有江苏地方文化特征的完整的苏商精神体系。比如明清之际，“经世致用”成为这一时期经济伦理思想的主要价值取向，“泰州学派”的王艮创立“百姓日用之学”，何心隐提出“人则财之本”的人本主义经济伦理思想，李贽则从“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的人性论出发，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观点。这些思想包含了十分深刻并且对现代苏商精神构建具有积极意义的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资源，极大地拓展了古代苏商精神内涵。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对这些思想加以批判和弘扬发展，对于培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起重要作用的现代苏商来说，难道不是可以参考和借鉴的一份珍贵遗产吗？《苏商精神及其社会价值》的作者结合江苏民营经济发展实际，重点提出了后国际金融危机条件下推进现代苏商精神转型的主要内容，比如创新创优精神、科学理性精神、诚信守法精神、人文关怀精神、团结合作精神，以及推进苏商精神转型的路径，对于加强当代苏商精神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曾经深刻揭示伦理学和经济学的分离，以及由此导致经济学的贫困和伦理学的缺陷。因此，苏商精神的研究必须打破经济学与伦理学的“明确分工”，促进不同领域学者的沟通与对话，真正建立起体现交叉学科综合优势的长效机制。有鉴于此，我十分赞赏卢雄勇同志在本书中综合运用伦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在比较与分析、历史与逻辑相结合中探讨了传统苏商精神的形成、近代苏商精神的变革和现代苏商精神的转型的客观原因和主要内容，并结合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探讨了苏商精神的社会价值。作者在苏商精神社会价值等五章中，将这一问题提高到一个新的现实的高度加以阐述。如何建设具有时代特征、江苏特色的社会主义苏商精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因此，《苏商精神及其社会价值》就超出了伦理学领域而具有了普遍的社会价值和文化意义。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的经济运行模式，是以法制环境为平台或背景的，所以，它作为一种高扬人的自由的经济形式同时也是一种法制经济，换言之，“经济人”的思考和行为都是目标理性的，唯一试图获得的经济好处

就是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马克思曾经指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并受到这种哲学的主宰”。人们不应该把自己看作某一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应该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中的一个公民,是自然界巨大总体中的一员。为了这个大团体的利益,人人应当随时地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的微小利益。现代市场经济的构建应有“道德之维”,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苏商精神及其社会价值》的作者充分认识到道德活动的主体在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合理地阐述道德人与经济人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主张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之下,经济人一定是道德人之经济人,道德人一定是经济人之道德人。这些观点说明作者在研究中,深入地理解和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是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始终需要遵循的原则。苏商精神建设的成功与否,也与此密不可分。卢雄勇同志的《苏商精神及其社会价值》一书的成功之处也多表现在这里。整部书广泛吸收前人优秀的伦理思想,在比较详尽地占有历代苏商思想资料的基础上,对构建苏商精神体系的各个方面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有不少是属于理论性的构建。当然这部书也不能说十全十美。书中有些看法是属于“百家争鸣”的范围,也有些更复杂的问题,比如苏商与经营管理行为关系问题,可能要与经济学、统计学等相关学科结合,才可以得出满意的结论。这一事实本身说明,苏商精神的研究需要不断地去开拓新的领域,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去深入研究。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必将对推进苏商精神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是为序。

(作者系东南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目 录

序	1
导论	1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2
1. 苏商及其主要来源	2
2. 古代苏商、近代苏商与现代苏商	7
3. 苏商精神的内涵	9
4. 苏商精神的社会价值	11
二、苏商精神研究综述	15
1. 中国(含香港、台湾地区)	15
2. 日本、韩国	19
3. 欧美地区	21
三、苏商精神及其社会价值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	23
第一章 传统苏商精神溯源	25
第一节 传统苏商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	25
一、重本抑末与明初苏商社会地位	25
二、富庶充裕的江南自然资源	27
三、明末清初苏商影响力与社会地位的提高	29
第二节 传统苏商精神的主要特征	31
一、重义轻利、本末兼顾的儒家伦理特点	31
二、柔和包容、低调隐忍的水乡文化特征	34
三、绅商相通、崇尚实干的吴韵汉风特色	40
四、自给自足、发家致富的坐商经营作风	42

第二章 近代苏商精神的变革	45
第一节 近代苏商精神转变的历史背景	45
一、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	46
二、农民革命: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	51
三、改良主义:自上而下的洋务运动	55
第二节 近代思想变革对苏商精神的影响	57
一、“师夷长技,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	57
二、“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思潮	61
第三节 近代苏商精神变革的主要特征	64
一、从“自给自足”向“通商竞争”转变	65
二、从“重义轻利”向“义利并重”转变	67
三、从“隐忍低调”向“创新开拓”转变	71
四、从“坐地行商”向“集团营商”转变	76
第三章 现代苏商精神的转型	83
第一节 现代苏商精神转型的可行性分析	84
一、增强“50后”苏商的道德责任	84
二、健全“60后”苏商的道德人格	88
三、强化“70后”苏商的道德实践	91
第二节 现代苏商精神与国内新商帮精神的比较	94
一、与浙商精神的比较	95
二、与鲁商精神的比较	96
三、与粤商精神的比较	97
四、与闽商精神的比较	99
第三节 现代苏商精神转型的基本原则	100
一、关注价值导向,注重社会公平的原则	100
二、坚持以人为本,协调劳资关系的原则	101
三、统筹生态资源,实现持续发展的原则	103
四、健全现代制度,加强科学管理的原则	104
第四节 现代苏商精神转型的主要内容	105
一、现代苏商需要更强的科学理性精神	106

二、现代苏商需要更强的创新创优精神	111
三、现代苏商需要更强的诚信守法精神	116
四、现代苏商需要更强的人文关怀精神	121
五、现代苏商需要更强的团结合作精神	128

第四章 苏商精神的社会价值 134

第一节 古代苏商精神的社会价值	135
一、古代苏商精神对经济发展的补充功能	135
二、古代苏商精神对政治的推动功能	139
三、古代苏商精神在文化上的整合功能	141
第二节 近代苏商精神的社会价值	142
一、近代苏商精神与扩大资本主义再生产	143
二、近代苏商精神与维护 and 规范市场秩序	145
三、近代苏商精神与社会建设	147
四、近代苏商精神与政治参与	150
第三节 现代苏商精神的社会价值	153
一、苏商精神在加快江苏经济发展中的主体作用	153
二、苏商精神在推动苏商加强江苏政治建设中的参与作用	156
三、苏商精神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推动作用	160
四、苏商精神在文化江苏建设中的补充作用	162

结束语	175
参考文献	178
致 谢	186

导 论

论及过往辉煌,苏商实力惊人。从明末清初到近现代几百年间,江苏经济社会特别是商业经济发展的过程,其伦理特征是显而易见的。苏商、苏商精神、社会价值,这一连串的名词与概念,始终是伦理学界,尤其是近年来伦理学专家、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话题。正确理解和把握经济社会现象离不开对其伦理内涵的认识。同时,理解和把握伦理问题又必须建立在对一定的经济状况尤其是经济关系的分析上。^① 诚如蔡元培先生在《中国伦理学史》中指出:“我国以儒学为伦理学之大宗,而儒家,则一切精神界科学,悉以伦理为范围。哲学、心理学,本与伦理有密切关系。我国学者仅以是为伦理学之前提。其他曰为政以德,曰孝治天下,是政治学范围于伦理也;攻击异教,恒以无父无君为辞,是宗教学范围于伦理也;评定诗古文辞,恒以载道述德眷怀君父为优点,是美学范围于伦理也。”^② 这一观点同时足以说明,伦理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围绕江苏这一区域、苏商这一群体和苏商精神这一现象,近年来海内外许多专家和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运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在苏商精神的发生起源、沿革变化、流派特征及其社会价值等不同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这些学术成果都为本书的研究和写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伦理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常释常新、辩证发展的认识过程,关于苏商精神特别是近现代苏商精神及其社会价值的几种概念在众多专家学者的论述中诠释各异,分歧迭见便是明显证明。伦理学研究应该围绕“问题”而展开,自无异议。^③ 因此,有必要在全书展开之前,对选题中所涉及的几个重要概念,如苏商、苏商精神以及苏商精神的社会价值等分别作一

① 郭广银、杨明:《应用伦理的热点探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253页。

②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2页。

③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5月版,第55页。

比较和界定,对近年来海内外苏商精神及其社会价值的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

一、研究对象的界定

1. 苏商及其主要来源

江苏始建省于清康熙六年(1667年),朝廷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二省,取江宁、苏州两府的首字而得名。江苏省辖淮安、扬州、徐州、通州、江宁、苏州、常州、镇江、松江等府,其范围大致与现在相同。江苏跨江临海,水网密布,湖泊众多,境内平原辽阔,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自古就是人口密度最高、百姓安居乐业的地区,在历史上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①苏商与徽商、晋商、秦商、闽商、鲁商、宁绍商帮、龙游商帮、潮汕商帮、江右商帮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明清十大商帮”。本文所讨论的苏商属于广义上的苏商范畴,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从历史上到现代,在江苏出生并创办企业和经营实业的各类人士;二是在江苏境内出生,前往外地创办企业和经营实业的企业家等在内的各类人士。苏商的变迁和发展不仅对江苏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而且还对全国各地企业家群体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按照苏商从业经历、经商地区和身份来源,历史上的苏商大致可分为士绅苏商、官办苏商、买办苏商和草根苏商四大类:

士绅苏商。士绅,主要是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作为官方代表和村民代言人,士绅阶层在传统中国社会一直扮演重要的管理角色。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曾经指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②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而组成。由于百姓聚族而居,人们共处于一块土地,分享有限资源,并以血缘为纽带,皇权、士绅与乡民相互制约,形成一种动态平衡。实际上,“直到近代……在中国乡村,小传统并没使价值观和城市上流社会的大传统产生分离。”^③秦晖等人认为,传统中国其实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④。明清之际,随着封建社会内部阶层的变动和士人“治生”论的兴起,从江南和东南沿海富庶地区,到内地的多处繁华城镇,越来越多的士绅开始兼营工商,一起谋利。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后,传统士绅阶层

① 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编:《省情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12页。

② 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6页。

③ 费正清著,杨品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230页。

④ 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69页。

向工商界的转化大大加剧,“弃士经商”已然蔚为时尚。士绅经营商战、承办实业,成为近代江苏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当时,著名士绅商人如清末状元张謇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另一状元陆润庠在苏州创办苏纶纱厂、苏经纱厂,李维元在镇江创办永利丝厂。状元而外,其他类型的绅士由科举仕途转入商界的,更是不乏其例。作为传统士人聚集的江南地区,既得开风气之先,又近地利之便,由士绅转商人的也最集中、最明显。以苏州地区为例,清末几十年间就先后有湖北学政、元和人王同愈,宰相之子、三品候补道潘祖谦,进士蒋炳章、吴本齐等几十人先后弃官经商。



清末状元、近代著名实业家
张謇(1853—1926)

考察促成士人由绅而商的直接原因,首先是近代江苏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变动及社会关系的调整,使传统价值观推动与之相适合的社会现实。在由农业宗法社会向现代工商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社会大众逐渐用经济成就的大小而不是道德文章的高低来评判个人的社会价值。往日目空一切、趾高气扬的士绅,迫于生计,现在却不得不俯首低眉,往生意场中求生活、弯下腰为稻粱谋。

其次,科举制度的变革及至废除间接推动了士绅向商人的转变。到晚清,被士人们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科举制度已经流弊丛生,成为维新派人士的主要改革目标。1905年,清政府下定决心,谕令“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同时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① 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各地数百万童生、数十万生员和数万举人贡人如大梦初醒,不得不另谋出路。时事维艰,部分读书人硬着头皮闯进了一向被视作贱业的商场之中,成为亦绅亦商的绅商,被迫开始走向近代民族资本家的艰难转变。

官办苏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传统中国社会流变出一个颇为奇特的新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既以科举功名和职衔、顶戴为标识,附身于官场,同时又广泛涉足工商经营活动,广泛牟利,成为晚清到民国初年一支举足轻重、非常活跃的社会集团力量。这一新兴社会阶层既有一定的社会政治地位,又拥有相当的财力,逐渐取代传统士绅阶层,成为大、中城市乃至部分乡镇中最有权势的在野阶层,苏商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正因为他们集官与商的双重身份

^① 《光绪政要》,第二十七册,卷三十一。

和双重伦理性格于一身,上通官府,下达工商,构成官与商之间的缓冲与中介,起到既贯彻官府意图,又为工商界请命的“通官商之邮”的作用,我将此类苏商称为“官办苏商”。他们所经办或承办的企业,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官商合作等多种。官商阶层的形成,既是明清以来官与商长期对流的结果,更是近代社会历史变动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以追逐剩余价值和高额利润为目的,既似商又似官,由似官而为官;用商力以谋官,由倾向于“官”发展到利用官府势力以凌“商”。



亦官亦商的北洋重臣——盛宣怀(1844—1916)与他创办的上海交通大学

官办苏商之中,最著名的当属清末北洋实业家盛宣怀。盛宣怀生于江苏武进,自小便立大志,为“作高官”而“办大事”,又以“高官”的力量把“大事”带上官僚垄断性。^① 盛宣怀得到晚清重臣李鸿章的赏识,以官方代表身份登场,从以“官”护商、谋取利润直至“利用官势以凌商”,到辛亥革命前夕,便由民族性很强的资本家变为用官方势力将轮船、电力、铁路、矿务、银行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企业联缀起来企图实行垄断的资本家。王尔敏在其所著《盛宣怀与中国实业利权之维护》中对盛宣怀作出较为全面的评述:“盛宣怀其在清末政治上地位之重要,不下于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而所从事建设各端,对于国家关系之大,尤远非李、张辈所能及。”“晚清工商企业家,俱在恶劣环境中,洋人侵凌下,创造生机,奋力求活。彼辈百川兢流,各自奔趋。而其中经营领域最广,而才识最超卓者,当推盛宣怀,允为晚清企业界一代领袖。”^② 从以盛宣怀为代表的官办苏商身上,

① 夏东元:《盛宣怀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6 月版,第 12 页。

② 王尔敏:《盛宣怀与中国实业利权之维护》,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11 月版,第 122 页。

不难发现其特殊的伦理特征。

买办苏商。买办一词来源于葡萄牙语“comprador”，在近代中国被译成“康白度”，主要指 1800—1910 年代，帮助欧美国家在中国进行双边贸易的中国商人。这些人通常外语能力较强，既熟悉欧美国情，又知晓中外双方贸易规则，因此他们一方面作为欧美商人与中国商人的翻译，同时亦可处理欧美国家商界与中国政府间的双向沟通。从本质上讲，买办是经纪人的一种雏形，也是近代中国经纪人和经纪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的阶层。五口通商后，靠近上海的苏州、无锡商人纷纷东进上海，不少人纷纷在外资商业开的银行、洋行做买办。他们既经营钱财的进出和保管，也参与业务经营和商品交易事宜，并常常代表洋行深入内地进行购销业务；同国内商人商定价格，订立交易合同，并凭借本身的特殊地位，在货物的收付上取得双方的信任。买办苏商成为了外商对华贸易的代言人。一些人逐渐失去公平的立场，趋附外国侵略势力，欺压中国商人，有时还可以在列强根据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勒索的赔款中分享“赔偿金”。他们中的不少人在积累一定数量的资金后，逐渐富裕起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大买办。同时，这些人在外资洋行或银行历练成熟后，便纷纷自立门户、自营商铺，开办起自己的银行、钱庄和商业机构，因此致富者颇众。

在经营形式上，买办苏商主要采取三种形式：其一是从朋友合谋到合伙经营；其二是按地区形成区域商帮，如苏州东山、西山形成的洞庭商帮、南京地区形成的金陵商帮、两淮地区形成的扬州商帮、主要从事金融和纺织业的无锡商帮等等，亦可谓大商帮中的小商帮；其三是以行业为纽带，通过联号制和股份制形成的业缘性群体组织。苏州洞庭商帮在上海经营钱庄等商业机构的主要是东山的严氏、万氏、王氏、叶氏、席氏等大族。席氏家族是其中的佼佼者，据统计，席家祖孙三代在外资银行任买办职的多达 14 人。^① 善于经商，敢于开拓和冒险的家族传统，使大批进入上海租界的席姓子弟充当起与洋人开展贸易和交际的中介，席元乐家族即以他们所挟的巨资和实业为保证，很快得到外国商人的青睐。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席氏家族三代人在 6 家英国银行，2 家美国银行，2 家日本银行，和各 1 家的法国、德国、意大利银行服务，并前后出了 11 个买办，如执上海金融牛耳的汇丰银行，自同治十三年（1874）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的 64 年间，全由席家祖孙三代担任买办。同时，席氏家族又将积累起来的巨资用于开设钱庄、银行和丝绸、面粉及文化教育等行业，形成著名的买办世家。

^① 《珠里小志》，江苏古籍出版社卷六，卷一，《人物》。

草根苏商。学术界一般认为,“草根”一词直译自英文中的 grass roots,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同政府或决策者相对等的民间势力;一是指同主流、精英文化或精英阶层相对应的弱势阶层。我在此借用同乡先贤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提出的“草根工业”理论^①,将近代从社会底层中产生的此类苏商统称为草根商人,用以形容在江南农村开办手工业的这部分苏商,以区别于士绅及官僚阶层。因为从他们的创业过程看,草根苏商大都出身于市井弱势阶层,其家中并无太多显赫的身份、社会关系或家族背景,在建厂或创办实业初期资本金相对薄弱,也没有更多可资利用的经济和社会资源。但因他们出身市井,思想上往往没有太多儒家伦理文化的羁绊,其观念解放,决心也大,经营贸易理念更注重从实际出发,也容易接受和学习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管理方法和经验。



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接见
荣毅仁等工商界代表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由小农经济向规模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必须有一外来的触发和支撑,“草根商人”正是其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草根苏商们创办的这些手工业作坊如同草根一般韧性顽强,遍地开花,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性。他们一方面努力适应时势发展并捕捉创业和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竭尽全力至创业卓著,在旧中国的棉纺织、面粉、火柴、水泥及至金融等近代民族

工业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草根苏商中,比较突出的有近代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和张石君等,他们在无锡创办振新纱厂,还有创办鸿生火柴厂的刘鸿生,在南通办大伦纱厂的张勖史,在无锡办业勤纱厂的杨宗濂、杨宗瀚兄弟等人。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911年间,草根苏商在江苏各地兴办的企业达1200多家,仅资本金在5千万两白银以上的工商业企业就有115家,资本总额为4252万元,约占全国新办民族企业的50%。从1895—1913年,全国共有华商缫丝厂97家,资本总额为1158.4万元,其中江苏就有37家,资本金953.7万元,占总额的82%。^②

^① 费孝通:《行行重行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23页。

^② 《江苏经济社会史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238页。

2. 古代苏商、近代苏商与现代苏商

苏商有着悠久的历史,更有着辉煌过去。从邗沟兴运、吴王煎盐,到隋唐时期大运河开通,江苏境内一直是客商云集之地,商业因子因此绵延不息。历代苏商主要经营地产大宗物品如粮食、丝绸、棉布、茶叶等,另外刻书业、医药业也较发达。清末以后,随着苏商的实力和资本迁向上海,金融业迅速崛起,钱庄、银行、证券、典当业也多由苏商涉足,其中尤以洞庭商人最为著名。为便于理清苏商伦理的发展脉络,从纵向的时间顺序出发,苏商可分为古代苏商、近代苏商和现代苏商三大类别:

古代苏商。指从春秋战国到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特别是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因先天资源禀赋充足而造就的苏商。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可以称为古代苏商的优秀代表。吴越争霸,勾践战败后卧薪尝胆十年,终于灭吴。范蠡为避勾践迫害,同时有感于商业的重要,毅然辞官下海,在宜兴经商,被天下人亲切地称为“陶朱公”。这位昔日高官并没有感到经商的失落,时常身穿普普通通的衣服,乘坐一叶扁舟,往来于江湖之上,“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开启了苏商致富之先河。范蠡经商致富后,坚持富而有德,将十九年中三次获得的千金统统“分散与贫交疏昆弟”,这一举动被司马迁称为“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①

范蠡的这种商德影响了无数代苏商。历经秦、汉、唐、宋、元至明清时期,传统苏商发展进入黄金期。元代后期,具有传奇色彩的沈万三从湖州路乌程县南浔镇(今浙江南浔)迁居平江路长洲县(今江苏苏州)东蔡村,并把周庄作为立业之地,“万三住宅在莺西北半里许,即东庄地及银子浜、仓库、园亭与住宅互相联络”,^②“万三家在周庄,破屋犹存”。^③他通过垦殖积累原始财富,并大胆地“竞以求富为务”,开展对外贸易活动,迅速成为“资巨万万,田产遍于天下”的江南第一富豪。江苏本地商人以生活于太湖东、西山的洞庭商人最为著名。早在明洪武年间,西山人蔡仲铭



被天下人称为“陶朱公”的范蠡

①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1992 年 11 月版,第 177 页。

② 《周年镇志》卷二。

③ 杨循吉:《苏谈》。

就开始在淮阴经商。明朝初期,朝廷从巩固政治统治需要出发,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商业的政策,为商业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到明中叶,洞庭人大规模地外出经商,明代小说家冯梦龙记载,“洞庭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①。洞庭商人经营的地域范围有海外,有边疆,有内地,商品范围也多种多样,不拘一格。到清末,洞庭商人更是在上海等地专门从事对外贸易。明永乐年间,江苏还出了一位对外贸易的大官商郑和。郑和以南京为基地,七下西洋,最远到达今天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等国家,收购当地的香料、象牙、药材等商品,执行外交使命,这位传统苏商的杰出代表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近代苏商。从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至新中国建立并对民族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时期的苏商可称为近代苏商。与擅长金融票号的晋商和专注商品贸易的徽商不同,近代苏商是崇尚实业的新式商帮。自西风渐进,江苏因地处东南沿海,得风气之先,近代苏商自然不甘人后,他们纷纷进入工商业,或以实业兴国,或以经商富民,成为推动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毛泽东在建国后对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历史曾经做过总结,“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民族)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②这四个人中,张之洞曾长期担任两江总督,任职地在江苏,应视作洋务派之中坚人物;张謇为江苏南通人,他生在江苏,长在江苏,大半生实业过程均在南通境内;范旭东所创办的永利化学工业公司选址南京,即今天中石化南京化学工业有限公司之前身。这段著名的论述,概括了近代苏商在民族工业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他们遵循着“远官僚,亲商人”的古训,务实创业,低调做人,孜孜不倦地追求着“事业富国”。

在本质上,近代苏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重要代表之一,他们身上同样具有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与复杂特征。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成长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自身经济实力的发展上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也被资本主义列强的商品输出所遏制。近代中国的自然经济与封建统治者形成了限制近代苏商正常成长的重要因素。尽管近代苏商与封建官僚阶层很少有来往,使他们避免重

① 冯梦龙:《醒世恒言》,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11页。

② 《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一卷,第225页。